

我国产业结构转换 的紧迫性和基本支撑点

□林致远

80年代末,我国城镇居民对彩电、冰箱和洗衣机等新一代“三大件”耐用消费品的需求日趋饱和,而代表着消费升级的大屏幕彩电、高级音响设备、录像机、摄像机等产品的需求则逐渐活跃;同时,内陆农村居民因购买力不足而对新一代“三大件”耐用消费品尚处于潜在的需求阶段。诸多迹象表明,我国经济在80年代主要由一般轻纺消费品和耐用消费品工业的扩张推动的轻型化发展在90年代的入口处必然发生转折,产业结构的升级由此正面临着—个契机。因为,在总量增长与结构变动的关系中,逻辑的顺序似乎应当是,总量高增长率引起需求结构高变化率,而需求结构高变化率拉动生产结构的高转换率。

然而,这一契机最终未能启动相对高度化结构下的增长格局的出现,尽管这一结果乃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缘故,但其直接的缘由却是由于始于80年代中期的以家电为代表的一批新产业的兴起没能驱动相关配套的新技术产业群的出现,自身却一直在产品十年一贯制的粗放经营方式的怪圈中徘徊不前。以家电为代表的耐用消费品本身从产品、原材料、工艺装备到产品研制开发,无不与现代技术紧密相连,以我国的市场规模,完全可能使之成为启动点,把相关的配套产业带动起来:—方面把新技术扩散到原有产业,另一方面形成自己的从主机关键部件、外围设备到工艺装备、专用材料和装备的产业系列,进而通过消化和掌握核心技术,形成开发能力,从而建立起具备自主发展能力的新技术产业群,使新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大增强。但由于新产业长期满足于搞散件组装,至今尚未摆脱现有产

品靠进口关键零部件,新产品靠从头引进的局面。其结果是,—方面没能建立起支持产品开发的关联产业群,另一方面在家电这个技术相对密集、技术更新很快的产业内,始终维持着数量扩张的粗放经营方式,致使市场开拓缓慢,最终丧失了发展势头。

那么,如何正确看待90年代我国产业结构变动的的基本态势呢?从衡量工业化阶段的最主要标志(1)人均GDP值、(2)产业结构中制造业所占GDP的份额来看,—般认为我国已步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与此同时,我国工业增长格局也显示出重型化的发展态势,—状况的出现易使人得出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已经开始的结论,然而更为深入的分析表明,重工业发展速度的超前不过是原材料、能源等初级加工品高速增长的结果,而整个经济增长格局仍处于较为低度和粗放的状态。

如前所述,因城镇居民收入状况与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引致了消费升级和因消费升级所产生的对国内机电设备的需求。但是,囿于我国现实的生产技术能力的空缺与进口替代进程的缓慢,这部分需求主要依靠进口予以解决,从而使重加工部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趋于弱化,阻滞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而大量的投资则涌入了技术低门槛的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部门(这一点与我国的重工业是以钢铁、电力等基础产业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局面密切相关),使得基础产业与基础设施的供求循环在投资支持下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基础产业与基础设施都带有建设周期长、资金回收率低、物质投入强度大等特点,容易造成建设周期延长、资金占压加速和资金周转缓慢等一系列问题,不仅使宏观效益下降,而

且会增加信用和通货膨胀的压力,引起经济波动;并且,这一格局与80年代后期以新型耐用消费品产业成长所带动的经济增长格局相比,在加工深度、物质投入、技术含量、附加值等方面相去甚远,因而带有粗放和低度化的性质。此外,90年代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开发区、房地产、城市建设、交通设施等,形成了对能源、原材料的巨大需求;受此拉动,基础产业如钢铁、化工、建材、煤炭、石油等部门得到快速增长,而基础产业本身是能源、原材料等的最大用户,因而基础产业与基础设施部门的急剧扩张加剧了对能源、原材料以及交通通信业的强劲需求,后者因之而成为制约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瓶颈”。

以上的分析表明,我国90年代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增长格局实质上是以高投入与高物耗为支撑的,总体上呈现出低度和粗放的状态。这一格局之下的投资规模扩张极易同积累相摩擦,再加上结构上的瓶颈制约,易使经济增长陷于困境;同时,从长期来看,以初级加工品为主导的高物耗增长格局在总量资源的硬约束下也将难以为断,因此,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已刻不容缓。

综观90年代我国产业结构变动的轨迹,可以得知,城镇居民的消费升级及因此而产生的对高加工度机电产品的需求关联到国外,而内陆农村居民因负担加重而导致的收入不增反减的状况又使得对家电等耐用消费品的需求萎缩,这样,国内市场便出现脱销与积压并存,短缺与浪费并存,开工不足与大量进口并存的供给适应不了需求的结构性疲软状态,开拓市场需求已成为生产者面临的迫切任务。针对我国消费市场明显的消费升级趋势与低水平消费并存的二元化特征,市场需求的开拓将取决于生产者两方面的能力:提高产品性能、档次的能力和降低成本、货价的能力,即产品开发能力。当然,首先应当看到,由产品自身的制作特点、工艺流程以及社会分工日益深化趋势所决定的产品开发能力必定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产业部门所支撑的,这些产业部门之间通过相互提供中间产品,延长了生产链条,提高了加工深度和技术含量,客观上加大了高度加工部门的生产比重。所以,产品开发能力的强弱实质上反映而且取决于占各种比重的不同类型和水平的技术之间的相互联系,即技术结构的状况;而产品开发能

力的升降则是技术结构及其聚合程度变动的结果。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揭示与外界环境相互作用的产业之间联系的产业结构本质上是由技术结构决定的,因此,优化与调整产业结构归根结底取决于技术的进步与创新,而我国当前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格局所面临的困境则主要是受到技术进步与创新因素空缺的制约的结果。应当指出的是,这里所指的技术进步与创新的内涵已超出生产技术因素自身,它应当是生产技术、经营管理、劳动力以至于组织规模等诸因素的综合体,因为技术进步与创新必定是融合、渗透在生产力诸因素之中的科学技术因素的综合发展、进步与创新。

当然,技术进步与创新之于产业结构转换的重大作用不仅仅是摆脱当前困境所亟需,而且还在于:第一、从机理上说,引进新的重要技术或创新于某个部门之中,是一个与其他部门以及整个经济的运转相联系的纵横交错的复杂过程,技术创新借助于关联作用与扩散效应,将对产业结构转换产生猛烈的激发与推动作用。第二、就结构成长模式而言,从我国作为后起发展国的地位来看,利用后发优势,赶超先进发达国家的唯一途径便是实行跨梯度或倾斜突进式的结构转换模式,这一模式的顺利演进必须立足于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结构效益型增长方式。

那么,应当如何促进技术进步与创新,从而加速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进程呢?逻辑思路的找寻往往不能割断历史的脉络,所以我们首先应当回答的是:在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中,何以会出现技术进步与创新因素空缺的尴尬局面呢?

首先,在科研体制上,长期以来,我国模仿前苏联的做法,把主要的科研力量和资金集中到独立于企业之外的科研机构,造成了开发与生产的脱节,科研成果难以转换为现实的生产力。据统计,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几乎所有的大中型企业都设置了技术开发机构,而我国仅53%的大中型企业设置了这一机构。在科研人才分布与科研资金使用结构上,发达国家一般都是企业占70%—80%,专门科研机构占20%—30%;我国则相反,企业的科研人员及资金仅占全国总量的20%—30%,这是造成我国企业技术开发能力低,引进技术消化慢,产业技术落后的重要原因。我国科研成果生产转化率只有10%—30%,而

发达国家则高达70%—80%。

其次,十几年来,我国各行各业都引进了大量技术,这些技术唯有经过消化才能形成开发能力,这就需要更多的投入。但是,事实上,无论是政府的财政投资,还是社会投资,或是企业自我投资,都呈现出与企业技术进步不相一致的下降趋势。与此同时,在技术更新改造投资有限的情况下,有相当部分的资金却用到明显带有外延性扩大再生产色彩的项目及对象上,使得推进企业技术进步的投资在本来就十分紧缺的条件下更为紧缺,技术进步所能发挥的效能明显削弱。

第三,从深层的关系看,企业的技术更新改造投资不足,有限的资金被用到基本建设等其他方面,其原因是错综复杂的,但是,占投资资金70%以上的信贷投资是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它给企业更新改造的技术进步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其一、信贷资金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有明确的还本付息期限,而一个重大的技术更新项目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二者之间不可避免要发生矛盾;为缓结这一矛盾,诸多企业在选择中首先把眼光盯在能够短期见效益的项目上,银行等部门也常常从这一角度发放借贷资金,短期化资金迫使企业技术进步向短期化方向倾斜。其二、借贷资金因其较高的利息率,一方面给国有企业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促使企业把技术改造重点放在引进技术设备方面,甚至挪作它用;另一方面,在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看来,国有银行的资金是国家的,资金的盈亏应由国家承担。因此,他们想方设法争取立项,获取资金,但因技改的投资决策缺乏足够的科学论证,从而造成一些技改项目的投资失误。

基于上述的分析,拟提出如下对策,以推进技术进步和创新,进而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与调整:

1、调整现有的科研体制格局,以迅速提高我国科研成果生产转换率。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各类科研机构在自身走向市场以及在与企业的联合攻关方面,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传统的科研体制格局仍然制约着科技成果迅速转换为生产力的能力,科研成果的生产转化率未能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为此,在目前体制格局中仍起关键作用的政府应主动承担起这方面的职能,即在重大科研项目上,引导科

研机构与企业联合攻关,促使科研成果迅速应用到生产环节上去,并以此方式推进一批新兴产业的崛起;在科研人才配置与科研资金的使用结构上,逐步实现向大中型企业科研机构的倾斜。

2、鉴于投入不足乃是技术进步和创新缺乏推进力的关键所在,因而必须拓宽技术资金来源渠道,改变投入不足的困境,同时纠正技术投资在流向上的错位。针对我国的信贷型投资给技术进步与创新所带来的诸多障碍,必须重整技改资金构架,实行资本型投资政策。所谓资本型投资政策,是指由资金所有者投入并且归企业永久性使用,技术进步的效益由投资者分享,风险由投资者共担的资金。资本金可以由政府财政、城乡居民、企业、其他社会机构及外商等投入,也可通过直接投资如独资、合资及合作经营等形式投入,亦可通过资本市场募集而成。当然,作为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的资本市场系统,资本型投资市场的建立尚需相应的财政金融政策、法律制度、市场规则等诸方面的协助,以及各行为主体的积极参与。

3、针对我国诸多企业和地方政府热衷于引进技术,而不注重消化吸收的状况,政府有必要在选择重点、分配资金等方面作出统一安排和部署,同时大大增加用于消化技术方面的投入,在政策上保障资金的稳定来源。此外,还可考虑在立项、投资等环节采用招标等方式,引进竞争机制,并加大对技术资金使用方面的监管力度。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

参考文献:

- 1、胡春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重点及对策》,《经济研究参考》1997年第6期。
- 2、曹远征:《市场化、工业化、货币化进程与宏观调控选择》,同上。
- 3、周振华:《现代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效应》,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 4、林兆木等主编:《跨世纪的发展思路研究》,中国计划出版社1995年版。
- 5、王国刚等:《发展高科技资本市场 推进企业技术进步》,《经济学家》1997年第1期。
- 6、杨凤林等:《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同上。